

毛 主 席  
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簡介

西藏民族学院宣传部翻印

一九七七年十月

# 毛 主 席 語 录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 前 言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十月十九日胜利地到达陕北吴旗镇，同年十二月进驻瓦窑堡（今子长县），一九三六年七月移驻保安（今志丹县），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进驻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毛主席、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将近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里，毛主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为我党完整地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总路线；进一步指明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区别又联系的辩证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光明前途。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个战胜敌

人的主要法宝；亲自培育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彻底革命的延安精神。

在这十三年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许多重要会议，发动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战胜了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长期的人民战争，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美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这十三年里，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写了大量的光辉著作。《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百五十八篇文章中，在陕北写的就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在延安写的有九十二篇。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主席在陕北的十三年，是光辉战斗的十三年，是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十三年。毛主席在延安的伟大革命实践，是永远鼓舞我们艰苦奋斗，继续革命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 目

# 录

|                                      |         |
|--------------------------------------|---------|
| 前 言 .....                            | ( 4—5 ) |
| 一、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            | ( 1 )   |
| 二、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 6 )   |
| 三、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 .....               | ( 23 )  |
| 四、开展大生产运动 .....                      | ( 33 )  |
| 五、延安整风运动 .....                       | ( 41 )  |
| 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br>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 | ( 53 )  |
| 七、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                     | ( 58 )  |
| 八、毛主席转战陕北 .....                      | ( 64 )  |
| 结 束 语 .....                          | ( 76 )  |

# 一、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党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在全国建立了十多块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王明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拒绝接受毛主席关于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正确意见，在军事上否认敌强我弱的形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陈兵敌区，“御敌于国门之外”，受挫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穷于应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从瑞金到遵义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中央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毛主席指出：“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

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

王明的错误路线，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使党的力量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革命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而自封为“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原来是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的错误越来越不满，强烈要求停止执行王明的路线。在长征中，毛主席向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作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部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逐步觉悟起来。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是我党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开始新的长征。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二占遵义，突破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把蒋介石几十万军队搞得晕头转向，远远甩在后边，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摆脱了被动的局面，取得长征中决定性的胜利。

正当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等机会主义分子，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会理会议上他们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罪恶阴谋未能得逞。

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胜利进军，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六月，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了迎接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潮，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是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的张国焘，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提出一条到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退却逃跑路线。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会后，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毛主席亲率右路军绕过松潘，战胜严寒和饥饿，横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向班佑前进。但张国焘率左路军进至阿坝地区后，违抗北上命令，擅自南下，公开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甚至阴谋用枪指挥党，以武力危害中央。在这紧急时刻，叶剑英同志连夜将张国焘搞分裂的电报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八月，党中央在四川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罪行，决定将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组成北上抗日支队，脱离危险区域，向陕北前进。北上抗日支队，翻过岷山，突破腊子口，越过六盘山，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旗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时，敌人四个骑兵团尾

追而来，为了不把敌人引进根据地，毛主席当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会后，毛主席亲自指挥我军步兵打敌骑兵，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三个团，这是长征切尾巴的一仗。从此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内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外有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处在严重危机之中。

刘志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对毛主席忠贞不二，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一九三五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执行者，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刘志丹等同志。在肃反工作中，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

吴旗镇战斗后，毛主席率领红军主力沿洛河川南下，到达甘泉县下寺湾（陕甘根据地首府所在地）。党中央当即纠正了陕北根据地的“左”倾错误，释放了刘志丹等同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党分子高岗也是在这次纠“左”时被挽救出来的。但他飞扬跋扈，反说什么“陕北救了中央”、宣扬“地方主义”，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这完全是颠倒历史。

十一月，毛主席为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又部署了直罗镇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以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边区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犯，

妄图在富县地区夹击我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我军在富县西南的直罗镇摆下了“口袋阵”，以小部兵力诱敌一〇九师进入直罗镇，主力从南北两面夹攻，全歼敌一〇九师，活捉敌师长牛元峯。追击中又在黑水寺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的“围剿”。

毛主席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当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时，坚持退却路线的张国焘却率领被他欺骗的红军南下，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地区退却，另立“中央”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革命纪律，使南下红军遭到重大损失。一九三六年一月，党中央命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六月，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迫使他取消了伪中央，同意北上。当北上到甘肃时，张国焘继续坚持错误，用欺骗手段，命令四方面军前卫部队从甘肃靖远渡黄河向青海西进，结果两万多人除几百人在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下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四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反党行为，作了系统的总结。毛主席指出：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伐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服从，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春，他以祭黄帝陵为名，只身逃出边区，投靠国民党

充当特务。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将张国焘开除出党。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在整整两年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中国工农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千万追兵阻敌，每人开动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华里，纵横十一个省，战胜了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三大主力共同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这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是毛主席北上抗日路线的伟大胜利。

## 二、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了“绝对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全东北。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入华北地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形势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我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在一九三三年初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准备同国民党军队签订抗日协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

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我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红军主力转移到西北，到达抗日的前进阵地，造成了推动全国抗日的新局面。革命形势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了灭亡中国这个基本事实，鼓吹革命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笔直又笔直”。否认各中间阶级、阶层的抗日要求，说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就是“全部永世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对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等等。坚持关门主义、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毛主席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二十七日，毛主席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毛主席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基本形势出发，深刻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说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毛主席指出：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主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同，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又怕革命的彻底性，是个软弱动摇的阶级，当日本侵略者威

胁到它的存在时，是能够参加抗日而成为我们的同盟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反革命的，但其中的亲英美派与日本发生利害冲突，可能倾向于抗日方面。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在这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主席正确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和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必要性：“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它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关门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忠顺的奴仆。为了更广泛地争取各抗日阶级进入统一战线，毛主席提出用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并阐述了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性质和各项政策。由于统一战线中存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着重强调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唤醒全党牢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报告最后论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指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凡是正义战争都是互相支援的，还正确解决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毛主席的报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推动全国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我们党根据瓦窑堡会议决定，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毛主席亲自率领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强渡黄河，进行东征，准备取道山西，开赴河北、察哈尔抗日前线。但在红军进入山西后，蒋介石协同阎锡山调集二十万兵力阻挡红军的抗日去

路，同时又命令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驻陕、甘的军队，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东征的红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给蒋、阎反动军队以迎头痛击。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战，党中央决定红军主动撤回黄河西岸，于五月五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反蒋抗日”的政策，改为“逼蒋抗日”的政策。五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延川太相寺会议上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进，指出：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近万人），筹备了抗日的经费，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红军回师陕北后，国民党军队仍继续向我方进攻。六月初，红军又向西进军，对进犯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后方。十月，西进的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蒋介石调集胡宗南、张学良五个军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十一月，红军遵照毛主席“坚决打击蒋胡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之目的，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以少部兵力阻击东北军，集中主力在甘肃环县的山城堡，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又两个团，这是结束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打击了蒋胡顽军，争取了东北军，动员了陕甘宁的广大人民，包括回、蒙等少数民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和一系列策略的转变，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早在一九三五年冬季，我们党就开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和统战工作，他们中的爱国官兵对蒋介石的卖国和内战政策日益不满。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接受

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张、杨与红军互派代表，多次谈判，一九三六年夏，双方签订“局部停战协定”。此后，张、杨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但拒绝他们的建议，而且派遣三十万嫡系部队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并监视张、杨的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上旬，蒋介石亲自去西安逼迫张、杨进攻红军，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和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愤慨，张、杨被迫于十二月十二日扣留了坚持卖国、内战和反共的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扩大中国内战，以利灭亡中国。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秉承主子的意图，打着“讨逆”的旗号，极力准备进攻潼关，轰炸西安，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英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主张南京西安之间达成妥协。国民党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也竭力要求和西安方面谈判解决。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

张、杨在发动事变以后，就立即电请中共派代表去协商解决西安事变。毛主席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事变的性质、意义和发展前途，批判了张国焘提出要“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的极“左”主张，英明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前往西安，与张、杨协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同时，红军开赴潼关、商洛一带，准备打击亲日派的军事进攻。周恩来等同志在戒备森严、情况极其复杂的西安，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与张、杨协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并深入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给广大官兵做工作，反复阐述和平解决西安变变的重大意义，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经

过极大的努力和斗争，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具有重大意义，毛主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是毛主席逼蒋抗日方针的伟大胜利。

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我党也作出了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这是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的一个重要政治步骤。

在国内和平形成以后的新形势下，王明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说，提出建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刘少奇、陈伯达以及张春桥、江青等一伙叛徒、特务追随王明，鼓吹国防哲学和国防文学等反动口号，反对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领导权。

一九三七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主持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和平实现后的政治形势，批判了不争取民主，只强调抗日的右倾观点，指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是三位一体的任务。而争取民主是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没有民主，就不能巩固和平，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实现抗战。毛主席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